

论语

主编 董治安
译注 张忠时
董文航

中国儒哲
十大名著



论语

主编 董治安
张忠纲
译注 董 时
文 航



中国儒哲
十大名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论语/董时、文航译注. — 济南: 山东友谊出版社,
2000

(中国儒哲十大名著/董治安, 张忠纲主编)

ISBN 7-80642-307-9

I. 论… II. ①孔…②董…③文… III. ①论语—
注释②论语—译文 IV. B22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50470 号

中国儒哲十大名著

主编 董治安 张忠纲

论 语

译注 董 时 文 航

*

山东友谊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9.25 印张 4 插页 220 千字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2001—3000

ISBN 7-80642-307-9/I·67

全套定价: 256.00 元

《中国儒哲十大名著》编委会

主 编：董治安 张忠纲

副主编：董 时 刘凤泉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刘凤泉 牟瑞平 张茂华

张忠纲 朋 星 姚文瑞

鹿风芍 董 时 董治安



儒学，源远流长而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智慧和文化的结晶。

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经过长期的积淀，已经渗透到我们民族的文化心理之中，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着深远的影响。今天，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必须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继承儒家思想的精华。为此，我们组织编写了这套《中国儒哲十大名著》丛书。

从汗牛充栋的儒学典籍中，我们精选出儒学思想家的十部著名著作，加以译注。这十部著作作为《论语》、《孟子》、《荀子》、《春秋繁露》、《法言》、《近思录》、《朱子性理语类》、《象山语录》、《传习录》、《思问录》。这些著作在儒学发展的不同阶段都占有重要地位，曾经对中国社会产生过巨大影响。无论从理论价值，还是从社会作用来看，它们都无疑是儒学著作的典范代表。

这套丛书以具有中等以上文化程度的广大读者为对象。在注释过程中，编者态度严谨，付出了很大努力。首先，选择善本，对原文作了认真校勘；其次，尽可能吸收前人和时贤的研究成果，力争做到注释详明，译语精当；此外，书前引言和篇前题解，撮其旨意，也颇能便利读者。

在新世纪到来之际，儒学热正在世界范围内升温。中华民族的伟大智慧，正在汇聚到世界现代文化的洪流中，这对全人类的

进步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我们相信，《中国儒哲十大名著》的出版，对于儒学进一步走向现代、走向世界，必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山东友谊出版社

2000 年 12 月



《论语》是记录儒学创始人孔子思想最可靠的材料，集中反映了他的思想体系。由于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论语》就成了最基本的传统经典。

孔子（前 551——前 479），名丘，字仲尼。春秋鲁国人。远祖为宋国贵族，四代前迁鲁；父亲孔纥，字叔梁，史称叔梁纥，鲁国武士，陬邑大夫，在孔子三岁时即去世。孤儿寡母相依为命。孔子说过：“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论语·子罕》以下引《论语》只注篇名）少年时做过吹鼓手、看管仓库、牲畜等事。又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学而》），他“发愤忘食”地学习前代文献、典章制度，并且学习书写、数学、御术、射箭、音乐、弹琴。他学无常师，学以致用，注重实践。二十二岁时即有人登门拜师，他便在家乡曲阜阙里办起私塾。

“而立”之后，孔子声望益高。齐景公曾向他问政，鲁国的权臣也拉拢他，但他潜心研究与教学，直到五十一岁时鲁定公才召为中都邑（今汶上县）宰。次年为大司寇，掌鲁国司法大任。由于“陪臣执国命”（《季氏》）和敌国的离间（如齐国送女乐，鲁君三日不朝），难施抱负，离任而去。从五十五岁起开始长达十四年的周游列国，推行自己的学说，先后历经卫、陈、曹、宋、郑、蔡、楚诸国，艰难困苦，几乎丧命。结果无一君主接受他的思想。六十八岁回到故乡，专门整理前代文献和著述，继续培养人才。他整理的书后世被尊为经，有《易》《诗》《书》《礼》

《乐》等。写了编年史《春秋》，记述鲁国十二代君主二百四十二年间的的大事，“微言大义”，褒贬深刻。除了《乐》外，上面诸书都有传本。

孔子一生培养了一大批出类拔萃的人才，习称“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其中最有名的有颜渊、子路、子贡、曾参、子夏、子张、有若等。

孔子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居特殊地位，并对世界有深远影响。作为中华文明第一个集大成者和伟大的传播者，其崇高地位无可争议。经过二千年的教育与熏陶，其思想已经融入民族的血液之中，也是不争的事实。即使在“文革”彻底反孔的特殊年代，儒学也在实际上调节着社会人际关系，而免于社会崩溃。（娄宇烈语）中华文明延续至今，成为世界上唯一保存下来的古老文明，不能否认孔子思想的伟大凝聚力量。因此，在“后现代”的今天，不少中西学者仍在积极寻求孔子思想对现代社会的意义^①。

同时，对孔子的指责、误解也历来不断，以近世为烈。其中最严重的莫过于“复古”。因为近代以来物质文明的高度发展，掩盖人文精神的价值，“复古”即为反动。实则孔子“述古而不复古”（张岱年）。他自己深知：“生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灾及其身者也。”（《礼记·中庸》）《中庸》称：“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他自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述而》）。那么，他所“述”的是什么呢？正如司马迁说的：“观三代损益，乃知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其所由来尚矣。”^②孔子正是“祖述”了中华民族文明创造合于人性的精华，而成就了伟大的人本思想体系。例如，他斥责反人性的殉葬制度，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孟子·梁惠王上》）正是由于人性的稳定性，才使得充满人性光辉的孔学具有“扩张性”，而且往往随着批判而传播、“扩散”。正是同样原因，使得其学说

经久不衰，而他也被视为“圣人”。自觉地把他的思想影响与时代要求结合起来，振奋民族精神，提高民族素质，是现代人的历史使命。

《论语》内容丰富，涉及哲学、政治、教育、伦理、历史、艺术等学科，全面表现了孔子的思想，并形成完整的体系。

哲学方面，孔子表现出进步的思想倾向。殷周统治者为了证明他们统治的合理，宣传主宰自然和人事的“天命”，但随着奴隶制的衰微，“天命观”发生动摇，重“人事”的思想不断涌现。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孔子主张“尽人事，听天命”，虽承认天命，但不放弃人的主观努力。与此相联系，他对鬼神采取怀疑态度，说：“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八佾》）两个“如”字表明他对鬼神真实性的怀疑。他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先进》）也把人事放在首位。他明确指出自己对事物的认识，不是“多学而识之”，而是“一以贯之”（《卫灵公》）。他说：“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君子名之必可言也。”（《子路》）这个“名之”之“名”是概念，“可言”之“言”即是定义表述。“正名”论就是定义论，是以理性认识揭示事物深层特质、普遍特征的方法。这正是“一以贯之”之“一”。至于曾参以“忠恕”释之，可能是学习夫子因材施教，有针对性地强调这方面内容而已。“忠恕”是两个范畴，不是“一”，而且也不能“贯之”于所有的人——例如对父母就有“孝”的范畴，更不要说一切事物，所以不是孔子的“一以贯之”之“道”。

政治方面，孔子主张“为政以德”（《为政》）。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为政》）他主张加强道德礼制，使百姓心悦诚服，所以反对苛政虐民，主张宽厚待民；反对过重剥削，主张使民富足；反对暴力杀戮，主张修治文德。他希望以此创造一个上下有序、和谐、安宁的社会。这种政治主张在当时是无法实现的，但从对人

民的态度来说，其思想是可取的。这些思想表现在管理学分支上，正被汲取作为现代企业管理学理论而广泛应用，如日本的所谓“《论语》加算盘”即是。

伦理学方面，孔子提出“仁”的思想，指出“仁”是“爱人”（《颜渊》），主张用爱来处理社会人与人的关系。这种爱既不是墨子的“兼爱”，也不是后来的“博爱”，而是“有差等的爱”。即以家族血缘为基础向外推及社会，以“孝弟”为本，推及夫妇、君臣、朋友。主张“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这样，既有宗法规范的限制，又有突破这种限制的人的平等意识。同时，他强调“仁者，人也”（《礼记·中庸》）。为提高人的道德修养、精神境界，提出理论依据。孔子的仁学思想是“人的发现”，具有相当普遍与积极意义。在他的思想体系中，仁学占首要地位。

教育学方面，孔子提出很多有价值的思想。他主张“有教无类”（《卫灵公》），创办私学，打破贵族垄断文化教育的特权，促进文化发展。他主张学行并重，学思并重。他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学而》）“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强调学习的实践性和创造性。教学方法上，孔子总结出很多有益经验，如因材施教，举一反三，温故知新，多闻缺疑，等等，即使今天也还有着重要的借鉴价值。

道德修养方面，孔子强调主体的重要性。他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把道德修养归为主体的能动性。据此，他特别注意发挥主体意志的作用，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子罕》）在教育弟子时，引导他们树立远大志向，主张通过内省发现不足，从而“见贤思齐”，不断完善君子人格。

在其他领域，孔子也有许多精辟的见解，至今被广泛引述、称颂。这些精炼的论述并非散乱的诫条，而是完整的体系，其中

贯穿着三条主线，即理性主义的定义论方法，人本主义的仁学思想和创造、开放的学说结构。定义论是基础，与开放结构共同保证仁学思想的确立。由于理性主义的光辉而指明认识客观世界的方向，从而避免了像欧洲中世纪那样的黑暗神学统治；由于人本主义的仁学旗帜，符合人性的发展而深得人心，从而广为流传；由于学说体系的创造性和开放性，使融汇纳新成为可能，从而出现后来宋儒在思辨上的高度发展。这就是孔子哲学也是中国传统思想的主要特征，是其思想体系的主干，也是其生命力所在。

作为复杂的系统，《论语》所集中表现的儒家思想，是历史层次地展开的。首先在汉代展开的是神学层次，董仲舒把儒学的神圣性上升到“天”的绝对位置而不可动摇。从唐开始到宋代完成的是哲学层次，理学思辨登峰造极。“半部论语治天下”则是其政治学层次。明代以后伦理学层次成为主要形态，至今有人认为儒学是伦理哲学，即受其影响。现在则应是人格学层次。孙中山在近代革命中据儒学提出人格理论，认为人格建立既是革命的动力，也是革命的目标，人格普遍建立是人类进步的标志。^③不少学者据此深入探求，乃至有儒学是“人格学”的命题。^④这是现代社会对儒学核心层次的呼唤，是儒学对现代人的教诲与支持。现代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人与自然对立，人与人隔膜，人自身空虚失落，恰与儒学的人格理论需求相应，而使人格学层次突现出来。

孔子说：“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子罕》）《中庸》称“智、仁、勇”为“三达德”，这就是健全人格的三方面内容。三者以“仁”为重心，“智以知仁，勇以行仁”。孔子教学的六艺，“礼乐”以育“仁”，“书数”以育“智”，“御射”以育“勇”。（李炳南语）现代的“德、智、体”“三育”，是对孔子的继承，与心理学确认的情感过程、认识过程和意志过程一致，全面概括了人格发展不可缺少的内容。人格以平等独立为标志，孔

子说的君臣、父子等关系，是互为条件的，父慈子孝，在人格上是平等的。“匹夫不可夺志也”，“志”是人格的独立性与不可侵犯性。今天“君”没有了，但上下级关系还有。过去的关系是上指的，今天则下指；孝慈关系，由重孝而重慈了。其他关系亦然。这是个体人性自觉普遍实现的历史趋势决定的，是人格平等独立时代发展的必然。假若过去社会条件不可能充分实现人格的平等独立，那么今天则可以完全实现。应该说《论语》的人格理想，在今天才得到实现的条件，其现实价值也在这里。

关于《论语》的成书，《汉书·艺文志》说：“《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那么《论语》之名即语录论纂、编排之意。

在汉代《论语》有三个传本，《鲁论语》二十篇，《齐论语》二十二篇，《古文论语》二十一篇。西汉末张禹以《鲁论语》篇目为据，合《齐论语》而成新本，后刻入《熹平石经》，一直流传至今，也是唯一的本子。东汉时《论语》列为“七经”之一，宋人朱熹合《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为“四书”，被官方确认而广为流传。

《论语》二十篇，各取开头二三字为篇名，每篇若干条，每篇大体有一个中心论题，但与篇名无关。

《论语》的释本很多，有人统计在三千种以上，多数已不得见。现在常见到的重要释本有魏人何晏《论语集解》及邢昺为它作的“注疏”，被选入《十三经注疏》，宋人朱熹《论语集注》及近人程树德《论语集释》，还有清人刘宝楠《论语正义》被选入《诸子集成》，流传也较广。目前在社会上影响最大的是杨伯峻《论语译注》，一再刊行，对《论语》的传播起了很大的作用。

对笔者来说还有两个本子要提到，一是吴林伯师的《论语发微》，一是现代国学大师李炳南教授的《论语讲要》。吴师为马一

浮入门弟子，观点方法都有所继承，不乏深识可取；李炳南教授对儒佛哲理都有极深造诣，对儒学有深见卓识，如“人格学”命题即为所出。

以上诸本都是本书参考的重要本子，由于本书的普及性质，尤重翻译，注释则力求简明。因为几乎每条原文都有几种不同乃至对立的解释，不是一般读者能立即分辨清楚的，所以尽力把对不同观点的选择、认定通过翻译表现出来，与注释互参而把握原意。翻译首先要“信”，即忠实地把原文含意用现代汉语译出来，这里牵扯到许多难以完全解决的问题，自然不是笔者能够做好的，而且就所见到的译文，多有不令人满意之处。这里不妨提出几条探讨。

《乡党》“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长期以来被误解误用，尤其被“饮食文化”论者——这个新出现的词组含义模糊，好像追求吃喝乃至大吃大喝就是具有文化——引为论据。其实《说文》：“精，择米也。”不过把米拣干净些；用青铜刀切的“脍”，也不会太“细”，就不妨再“细”些。不仅如此，这些也不去追求，仅仅“不厌”而已。孔子有明确的饮食观，最重要的观点是“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学而》）。把“食无求饱”视为“好学”的条件，因为“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阳货》）。现代科学实验证明，两组小鼠，限食者比不限食者寿命、智力都优得多，与孔子所见一致。这对“知识经济”时代的求知者是多么明智的教诲，假若“以今释古”，一味用现代手段求“精”求“细”，岂不完全违背圣人教诲与科学规律！

遗憾的是类似的误解并不少见。《述而》“发愤忘食，乐以忘忧”，有的译为“……快乐便忘记忧愁”。实则“乐”是“以”的前置宾语，即“以乐忘忧”，“用乐观排解、忘却忧愁”。“以”或理解为表目的连词“来”，意思一致，与“一以贯之”之“以”

相同。如上译则人人可做到，何必伟大哲人。

《先进》“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对后一“以”字的理解，有的认为是“用”，任用从政。其实是“因为”或“认为”的意思，与第一个“以”意义有差别，前者指客观的事实，后者指主观的态度。完全可以把前句看做后“以”的前置宾语。这是师生对话的宽舒气氛和启发式教学的恰当用语。如释为“任用”，即与后面的“与点也”的情景不谐，且有牢骚意，不合夫子“无可无不可”（《微子》）的人生哲学。

《子罕》“出则事公卿……不为酒困，何有于我哉？”本来“何有”为“不难之词”，有的译为“……这些事我做到了哪些呢？”倒相反了。若连“不为酒困”都做不到，谁还尊他为“圣人”呢？

《为政》“由！诲女知之乎！”有的译为“由！教给你对待知或不知的正确态度吧！”“知之”没有同时兼含正反二义的功能，也担当不起“对待……态度”那么大的结构。即释为“志之”，记住它，与“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里仁》）之“知”同义，当更近于“信”。

可讨论的地方还有不少，所以如此，意在努力把握原著；由于功力不足，笔者对本书所论所释所译并不自信，希望读者诸君指正。

注释：

①这里举出两个儒学以外的学者为例，一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参与举办纪念孔子诞辰二千五百四十周年大会，其代表泰勒博士说：“如果人们思索一下，孔子思想对于当今世界的意义，人们很快便会发现：人类社会的基本需要，在过去的二千五百四十年里，其变化之小是令人惊奇的；不管我们取得了进步也好，还是缺乏进步也好，当今一个成功、昌盛的社会，在很大程度上仍立足于孔子所阐述的许多价值观念。”（见《纪念孔子诞辰 2540 周

年纪念与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上〉)二是杨振宁说：“儒家文化注重忠诚。注意家庭人伦关系。注意个人勤奋和忍耐，重视子女教育。这些文化曾经，而且将继续培养出一代又一代勤奋而有纪律的青年。”加上别的条件，他认为中国对下个世纪科技发展能起决定作用（见《中国教育报》1997. 3. 16 熊秉明《杨振宁和他的母亲》和复旦大学出版社《杨振宁传》第130~132页）。

②《史记·礼书》

③《孙中山全集》（八）第136—320页（九）第247页（十）第156页。

④《护弘小品汇存》第410页。

目 录



引言	/001/
学而第一	/001/
为政第二	/011/
八佾第三	/023/
里仁第四	/037/
公冶长第五	/049/
雍也第六	/065/
述而第七	/081/
泰伯第八	/097/
子罕第九	/109/
乡党第十	/123/
先进第十一	/137/
颜渊第十二	/153/
子路第十三	/167/
宪问第十四	/183/

卫灵公第十五 /205/

季氏第十六 /221/

阳货第十七 /231/

微子第十八 /247/

子张第十九 /257/

尧曰第二十 /271/